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二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一年十月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¹/₈印张·167
1962年2月第1版 1981年3月成都第2
印数 10,501—60,200 册
统一书号：11018·308 定价：0.75

目 录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	賀賡严遺稿(1)
關於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	
事件	梅汝璈(16)
短稿十篇	
郭松齡反奉側記	廖安邦(37)
蔣介石串通日本海軍帮助刘湘运軍用 品的經過	范崇实(39)
石友三发动反张学良戰爭的如是我聞	蕭 劳(41)
冀察特殊化前宋哲元和蔣介石的勾心 斗角	王式九(42)
韓复榘醞酿“山东独立”未遂的經過	韓多峯(46)
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鴻門宴”	董升堂(51)
关于蔣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 見聞	麦朝樞(53)
郭泰祺被蔣介石免职的内幕	楊玉清(56)
岡村宁次与孙良誠的一次談話	周永业(57)
日寇投降后岡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議	龐鏡塘(58)
我所知道的戴笠	沈 醉(61)

戴笠之离开黄埔 粟 鼎 (170)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 (211)

附注

对《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五页、第四十八辑二五〇页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八页、第三十七辑二三九页

对《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

七、二四九、二五一、二五三页，第三十七辑二三八、二四一页，

第五十五辑一九一页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

賀貴嚴遺稿

一 日本軍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及出兵济南 和国民党軍北伐的作战部署

当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北伐軍进军山东的时候，日本軍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济南发动了武装侵略。这是日本第二次出兵了。第一次出兵，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那时正是日本軍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組成的侵华内閣当政。他們看到蒋介石統率大軍由南京渡江北伐，便立即出兵山东，也曾侵入了济南。不过那次蒋介石因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将军要东征，南京受到威胁，乃将进占徐海各軍急剧南撤。因此，日本侵略軍到济南扑了一个空。但田中内閣对我国的侵略是有其深远的阴谋的。在那次出兵的同时，曾由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所謂“东方會議”，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負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的所謂积极政策。狂妄的“田中奏折”，也是在这时向日本天皇提出的。为了保証这一侵略政策的貫彻执行，田中内閣还对其国内反对侵华的进步人士实行了野蛮的鎮压，被迫害的达千人以上，其中被扣押的达三百余人。

日本軍国主义的第二次入侵济南与第一次不同。它是看到北

伐軍从魯南向北全面推进，迫使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等殘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才急急忙忙地拼湊起來的。日本內閣最初決定派第六師團全部進犯濟南。但因出動整個師團運輸不易，乃改變計劃，派該師團的齋籬旅團為先遣隊，以便迅速侵入濟南。後來看到北伐軍勢如破竹，恐怕先遣隊也不能按時趕到目的地，才又決定由駐天津的日軍中派遣三個中隊，由小泉中佐率領向濟南急進。這部侵略軍于四月二十一日到達，齋籬旅團到四月二十六日才到濟南。他們見北伐軍到了泰安，必須迅速控制濟南，就在濟南商埠大馬路、三馬路和緯一路、緯三路之間劃成東守備區，在二馬路、六馬路和緯六路、緯十路之間劃成西守備區。各個守備區都在街道交叉路口堆積沙包，設置活動電網，日軍守兵則實彈瞄準馬路上向他接近的中國人，不問你是軍人還是老百姓。這表明他們已完成了商埠的占領。至其第六師團的主力，則由福田師團長率領，從龍山徒步行軍，也于五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趕到了濟南。他們以為我北伐軍如無對日作戰決心，只要發動一次小規模的攻勢就能實現其侵略野心，故于五月三日向北伐軍駐在商埠的部隊發動突然襲擊，企圖一舉而趕走這些部隊，威脅國民黨放棄北伐計劃，以實現其控制華北的罪惡目的。當然，他們是有充分作戰準備的。在福田師團入侵濟南的同時，他們就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師團的動員，并作好了戰時編組，如濟南事件發展成為正式的中日戰爭，那末，他們就會源源出動其侵略軍的。

原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恢復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繼續北伐。接着就把參加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和與國民黨建立聯繫的各軍編成四個集團軍。蔣介石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任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各個集團軍都是由其自己原來所率領的部隊編成。第一集團軍計分為四個軍團和一個預備軍：第一軍團由劉峙的第一軍、顧祝同的第九軍、繆培南的第四軍編成，以劉峙兼任總指揮；第二軍團以陳焯的第二十六軍、范熙績的第三十七軍和另一部隊編成，以陳調元任總指揮；第三軍團以張克瑤的第三十三軍、我（作者原名耀組）的第四十軍和夏斗寅的新二十七軍編成，由我兼任總指揮；第四軍團以阮玄武的第三十四軍、鮑剛的第四十一軍、馬文德的第四十二軍與一騎兵旅編成，以方振武任總指揮；駐在江西的第三軍王均部編為總預備軍，以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但朱培德始終未就前敵總指揮職，後來只有朱世貴的第八師到了前線。

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從南京到徐州搞了一幕所謂誓師大會。三月底蔣再度到徐州部署軍事，向張宗昌、孫傳芳等部北洋軍發動了全面攻擊。這次的作戰部署是這樣：第一軍團位於台兒庄、韓庄之線，向枣庄、臨城、兗州之敵攻擊前進；第二軍團位於台兒庄（不包含）以東，向沂水之敵攻擊前進；第三軍團位於沛縣、豐縣之線，向魚台、濟寧之敵攻擊前進；第四軍團位於碭山、單縣、歸德，向金鄉、濟寧之敵攻擊前進。

第一集團軍各軍團於四月十日開始向各自目標進攻。除了第三軍團曾在魚台地區與孫傳芳部發生激戰，以致在北伐戰爭中以勇敢著稱的龔先師長不幸戰死外，其餘各軍團的對敵攻擊都很順利，特別是第一軍團正面之敵系張宗昌、褚玉璞殘部，已經不堪一擊。還因為從馮玉祥部借來了一列鐵甲車開路，迫使張宗昌在津浦鐵道上活動的白俄鐵甲車隊抬不起頭來，從而一往直前，簡直看不到敵人的踪影。故各軍都於四月二十日前後到达兗州——濟

宁之綫。經過短时休整，繼續前进。第三軍團系于四月二十二日自济宁与津浦鐵路平行向北追击，通过泰山山脉各隘路驅逐穆杆寨、白馬寺之敌而进入黄河南岸平原地区。在此期間，粮食缺乏，軍行較緩。占領穆杆寨以后，我即派遣陶峙岳師長率所部第四十軍第三師为追击队，携带干粮輕裝前进。沿途沒有遇到敌人，于四月三十日夜間到达济南附近，五月一日清晨进入济南城。第四軍團由方振武亲率第四十一軍和騎兵旅經汶上、肥城向济南挺进，亦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当夜入城部队駐地如下：第一、第九兩軍駐城內；第四軍初駐商埠，后又移駐新庄兵營；第二軍團駐济南东面的辛店以东；方振武部四十一軍第九十一師駐城內，第九十二、九十三兩師則与四十軍第三師同駐商埠；方部第三十四軍阮玄武部則駐新庄兵營。

我的第三軍團主力，于五月一日午前到达距济南西南十几公里之党家庄。当时我判断济南既有日軍盘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軍必須有作战准备，也就是我軍与敌人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距离。因此，决定即在党家庄附近設營。随即派參謀長謝履和所轄各部队联系，保持待机作战态势。我为了深入了解济南日軍动态，并視察第四十軍第三師的实际情形，于午后率領參謀、副官及卫队数人，亲赴济南。日軍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下有枪眼，上有帽堡，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鐵絲网，日軍在胸牆內作瞄准姿勢，其步哨則放出距工事綫数十米或百米不等。我当时已意識到：日軍的这种态势，在軍事意义上說，它已經占領了济南。中日两軍的冲突势难避免。为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有利地位，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團長王校膺所屬两个營，迅速从紧靠日軍的緯一路、緯二路附近駐地轉移到商埠

西端該師師部所在地集結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師師長陶峙岳商討對策，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

這時，忽聞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也于昨夜到達濟南城，在舊督署辦公。我初聞此訊，以為濟南情況正值十分嚴重，總部親來頂住，乃是好事。繼而想到統帥部處於日軍槍口之下，已陷於被動的不利地位，還會給所屬官兵以中日兩軍可以和平相處的錯覺，從而松懈戰鬥意志。因此，我立即赴總部去見蔣介石，除了大略談了一下從徐州北上以來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說明了商埠日軍作戰部署的嚴重形勢，提醒蔣特別注意。乃蔣聽了我的話以後，竟處之泰然。他說：日本參謀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為聯絡參謀，和總司令部同車到來，已令其向日軍司令部交涉，撤除其阻礙交通的工事。當時我的印象是：蔣介石並沒有意識到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濟南的企圖是怎樣一回事。他好像還是同住在上海租界一樣，有了帝國主義軍警的保護，就可高枕無憂。不過，我又以為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參謀本部派出，那末，他就有權和任何一級日軍部隊長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結果怎樣。當天下午，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協的空氣。我到普利門外觀察，看到日軍果然在撤除其在緯一路和緯二路地區所設置的障礙物。因此，我也誤認為日軍已經改變主意，放棄武裝挑畔。並由此而聯想到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華盛頓會議日本在英、美壓力下歸還山東半島的一段歷史。現在，英、美的國際壓力仍然存在，而中國的形勢也有了新的變化，日本政府改采溫和政策，並不是不可能的。由於有了這種幻想，我對當時的危急形勢，也是抱着樂觀態度，專待五月三日參加總部會議，以便按照新的計劃繼續北進。殊不知就在五月三日這一天早上，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濟南的武裝挑畔就爆發了。

二 日軍在济南挑衅及其一系列的暴行

日本軍国主义者既然要阻止国民党北伐軍渡河北进，以便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企图，那末，乘国民党北伐軍尚未渡河之前在济南发动军事挑衅，这是必然的步骤。所以日本侵略軍最高指揮官福田师团长知道蒋介石已迅速于五月一日夜間抵达济南，他就着了慌，不及等待胶济铁路的修复，便率领該师团主力由龙山徒步行軍，二日午前赶到济南，并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出击准备，在三日午前九时，就向靠近日軍駐扎的国民党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这时碰巧第七团的团、营长都去师部开会，群龙无首，突遭袭击，以致未能进行有組織的抵抗，因而这两个营损失非常惨重，特別是第二营的官兵，不是被敌人用刺刀杀死就是被俘虏，全部都被歼灭。該团团长王校膺因为事前沒有执行我叫他轉移駐地的命令，故遭此慘敗，自知責任重大，就在事变的当天逃跑了。这次日本侵略軍所以选择我四十軍部队作为攻击对象，不仅是在軍事上要排除靠近他的障碍，以便展开全面攻势，尤其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就是：要把它这次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塑造成为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在一年前砲击南京事变的重演，以便向国际上宣传，說各国过去搞的南京事变是由于賀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这次济南事变同样是賀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企图以此来欺骗世界輿論，并緩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它的矛盾。

由于日本侵略軍向第四十軍第七团第一营进行了突袭，引起了敌我在商埠的全面战斗。四十軍第三师的主力和四十一軍第九十二、九十三师都进行了有組織的抵抗，特別是九十二师，因为方

振武担负了卫戍济南的任务，該师被指定为卫戍部队，預先作了战斗准备，因而对于敌人的挑衅进行了頑強的反击。此时敌人受着我优势火力的制压，躲在工事后面抬不起头来。日軍福田师团长看到形势不好，知道再繼續战斗下去，可能激起我軍正式对之作戰，对它极为不利，乃改变办法，派間諜佐佐木中佐进城，恐吓蔣介石下令停火。佐佐木于下午二时許跑到蔣介石的司令部大叫大嚷，硬說我軍欺負日方兵少，发动了这个战斗；揚言日本國內正在动员，如果繼續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蔣介石本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作了屈从妥協的打算，現在听了佐佐木的謊言欺矇，对日軍发动的突袭，竟怀疑是衅由我起。因此，他立即接受了佐佐木的要求，派了十个參謀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我軍向日軍射击。入夜又严令我軍駐在商埠的部队全部退出。他完全落入了福田的圈套。这就是日本侵略軍五月三日在济南发动武装挑衅的主要情况。

日本侵略軍在发动武装挑衅的过程中，大肆屠杀我国軍民。凡是日軍所至之处，我軍官兵无论是在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不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残杀了許多非战斗人員。例如：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員会外交公署兼山东特派交涉員蔡公时以下职工十七人，都惨遭屠杀。事后据唯一逃出来的张姓工人証实，日軍在杀害蔡公时以前，先割去其耳鼻，然后加以枪杀。此外，日軍还炸毁了我济南的无线电台，事前未提出警告，以致該局职工大多被炸死；在济南邮局避难的許多居民被日軍作为俘虏，綑綁毒打。这些，都是五月三日发生的事。四日我軍已退出商埠，日軍借口屋內有人放枪，挨家挨戶进行搜查，又逮捕了很多居民，誣指为便衣队和

刘黑七(即刘桂棠)部匪軍，大肆屠杀。日軍对于被拘捕的我国居民則用绳子或鐵絲綑綁，不給食物。日軍还唆使其居留民义勇团寻仇报复，平日有过反日言論或取締过日貨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也被杀害了許多。据事后統計，这次被杀害的中国軍民总数达三千六百二十五人。日本駐济南領事西田在暴行发生几个月后向中外記者說：这次中国方面死亡达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三 日本軍国主义者玩弄的政治欺骗

日本軍国主义者估計到，他們出兵济南的侵略行动，直接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冲突，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干涉；同时深入我国内地作战，在軍事上要以最少的兵力去战胜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因此，他們一面发动武装侵略，一面玩弄了一系列的花招，綜合他們所作的勾当，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点：

(一)日本軍国主义者为了隐匿它的真实侵略的意图，极力把它这次出兵說成和一九二七年美国的砲击南京，英国的出兵上海，同样是为了保护侨民。当它发动武装侵略之初就声言，我的第四十軍有部分部队到了济南，搶劫了日商财产，杀害了日本侨民。捏造这一谎言，作为他們出兵济南的“正确理由”，并曾发动日本報紙对我大肆詆毀，把我所率领的軍队描繪得简直不成样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时不仅日本进步人士不相信，就连日本陸軍巨头宇垣一成因看到日軍警备区和所謂搶劫地点的接近，也在他的日記中写道：“这种宣传不可思議。”日本軍国主义者发动这一宣传攻势，是为了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責，蒙哄美、英帝国主义者，从而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其次，是愚弄国民党的腐朽軍人，使之放松警惕，麻痹斗志，不战而屈。后来张群从日本带回这类報紙，蒋介石

即免除了我的軍職，以此去討好日本軍國主义者。

(二)日本軍國主义者歪曲事实，把他們在济南发动的武装挑衅，說成是偶发事件。事实是这样：五月二日，蔣介石通过日本間諜佐佐木向福田要求拆除商埠工事，以免妨碍交通。福田对此故意避不作答，而将責任推到下面，說这是地区守备司令所作的，要由斋藤旅团长去处理。斋藤对蔣介石的这一要求，竟滿口答应，并以此来表示他們願意同国民党北伐軍和解。这时日本的宣传机构，在将要对我四十軍詆罵以前，竟对国民党北伐軍贊誉了一番，說“华軍紀律很好，对日軍并无敌意，所以斋藤願意拆除工事，与华軍成立和解”。在济南事变数月之后，上海組織的中外記者到济南视察时，日本駐济領事西田竟还以五·三事变目击人的身份說：日軍接受蔣介石的意見，于二日拆除了工事，济南問題本来就和平解决了的，万不料因此而招致了中国兵对日本的輕視，因而爆发了这个不幸事件。还說什么賀耀組以大官而竟逃走了，等等。西田的这一套胡言，是抹杀不了客觀事实的。日本軍國主义者自己发布的文件就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日本報紙所印的文件曾刊出五月三日日軍第六师团在济南附近的战斗要图，是日軍战斗开始后向其上级指揮官报告的文件，附印在所謂第一部济南事件宣传冊子上。这张图說明了日本侵略軍在发动武装挑衅开始后約两小时內的兵力配备和它向我軍进攻的实况。从当时日軍的位置看来，他們都是在二日从原来守备区拆除工事的路口出来，向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的一个营进攻的。它彻底証明了日本軍國主义者所发动的济南事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計劃的武装侵略，他們在济南商埠的拆除部分防禦工事，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达到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罪恶目的。

(三)五月三日上午八时，即日軍发动武装挑衅的前一小时，日本駐济領事西田領着日本天津駐屯軍队长小泉和几个參謀人員，到了城內蒋介石总司令部，裝扮成很“友好”的样子，詭称辭行。他們說：“济南現在已經沒有事情了，小泉即将率部回天津，我(西田)也要去北京跑一趟，特此來向你們辭行”，等等。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偵察城內我軍有无作战准备，同时麻痹蒋介石，使之不加戒备。当“辭行者”刚刚离去，侵略者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日本軍国主义者在发动武装挑衅以后不久，又指使“日本居留民义勇团”打着白旗，到城內外我軍駐地沿途叫喊：“不要惊惶，只是誤会，弄明了就会解决的。”

四 蔣介石繞道北伐 及其与馮玉祥在党家庄的會談

蒋介石在背叛革命后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統治，以便进一步反共、反人民。在北伐的过程中，我曾經起过“助桀为虐”的作用。原来蒋介石在济南事变中給日本軍国主义者吓破了胆，不敢继续渡河北进。蔣給第一集團軍所属各部下达的命令是全軍向南方撤退。当时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第一軍團的第一軍和第九軍，亦即蔣的嫡系部队，全部退至徐州；第四軍和新二十七軍退至兗州；總預備隊的第三軍朱世貴師退至泰安；我的第三軍團(不包括新二十七軍，退至党家庄、泰安之間；第二軍團陳調元部退至長清以西。只留第一軍李延年團和第四十一軍鄧殿藻團守济南城。蔣介石所下的这个退却命令，于五日晨二時送到我的總指揮部。我看了这个命令以后，大为震惊。当即写了一封信給楊杰，間接提醒蒋介石，希望蔣改变主意。信中首先說明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挠中国統一，以便分而治之。接着指出日軍

在济南的举动，系錯誤地估計中国軍隊非控制津浦鐵路就不能前进。不了解北伐軍既无重兵器，所需运输力量有限，粮食可經运河輸送，离开鐵道仍能进军。最后說到，张学良早已表示，只要南軍渡河向天津前进，奉軍即撤出关外，促成国家的統一。否則他們不能允許閻、馮爭夺京津地盤。今我全軍向南撤退，只是无端放弃統一机会，恰恰是中了日本軍国主义者阻挠北伐、分裂中国的詭計。不仅北伐不能早日完成，而且山东日軍的撤退亦将遙遙无期。这封信送去不久，蒋介石約我进城开会。會見楊杰，他告訴我，他們已經开过会了，决定改变命令，以陈調元的第二軍團，我的第三軍團和方振武的第四軍團渡河北进。第一軍團則因已經开始南撤，所以第一軍和第九軍仍退徐州，第四軍和新編第二十七軍仍退兗州，第三軍第八師仍退泰安云云。此时我意識到，蒋介石仍把他自己的和亲近的部队南撤，而只叫和他关系疏远的部队北上，心中另有鬼胎，但是有了这三个軍團北进，也能迫使奉軍向关外撤退，达成全国統一局面。后来第二軍團于五月五日以主力由济南以东渡过黃河，第四軍團的三十四軍和四十一軍則于同日由洛口渡河；第三軍團(缺新二十七軍)与第四軍團的高桂滋部則分別于七日自齐河渡河。虽然因粮食缺乏，行动困难，但渡河北进的各个軍團都很快就接近天津，給奉軍的撤退以严重的力量，閻錫山、馮玉祥的部队也迅速进占了北京。至此，北洋軍閥政府就宣告垮台，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在关內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

当时日本軍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仍然是繼續进行着的。当我第三軍團渡过黃河的时候，曾有日本飞机低飞侦察，高桂滋部队渡河时，还受了日軍騎兵的騷扰。因为我軍各部都能鎮定应付，毅然北进，不为所动，故敌人的牽制阻挠未能得逞。但在五月八日日軍

向我留在济南城内的部队发动了攻击，济南城当天就被攻陷，同时占领了济南附近的党家庄。

当蒋介石决定放弃继续北伐计划，下令全军南撤的时候，经我的极力反对而变更他原来的决定，使北伐军得以绕道继续北进，从而使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伸张到平、津，最后结束了北洋军阀政权的统治，这对此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对于击破日本军国主义者阻挠北伐，扶植傀儡政权，控制华北的侵略阴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北伐的行动，为蒋介石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又起了助桀为虐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附带谈一下蒋、冯在党家庄会谈的情形。我于五日上午十时左右，从济南城内回到了党家庄，这时冯玉祥的专车早已到达了，我即往车站迎接，午后三时许蒋介石在其总司令部高级人员的陪同下也到了党家庄，蒋、冯就在我的总指挥部晤见了。冯除少数卫队外，未带随员；同蒋一起来的有：杨杰、张群、黄郛、蒋作宾、杨永泰等人。蒋同冯主要谈到第一集团军今后的行动，盼望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出关外。冯玉祥承认担负起这个任务。他对日寇占领济南不甚重视。冯说：“只要我们占领京、津，组织统一政府，日军非自行撤退不可。”当时冯的态度就是这样。蒋、冯在我的总指挥部盘桓了一天，当夜冯玉祥宿专车中。六日晨冯离党家庄回开封。蒋介石则乘专车南下，他的总司令部一直撤到徐州去了。

五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后通牒与蒋介石的卖国外交

前面说过，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进行